

习近平点名称赞过哪些县委书记？

4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文章《三十四年后的追寻——“四有”书记谷文昌》，记叙了这位一直让习近平总书记念念不忘、撰文称赞“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丰碑”的县委书记的生平事迹。郡县治则天下治，习近平与“县委书记”一职深有渊源，他曾任正定县县委书记，对县委书记岗位之重要、责任之重大，有着切身感受和独到见解。据公开报道资料，习近平曾点名称赞多位“四有”县委书记：焦裕禄——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王伯祥——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谷文昌——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丰碑……

习近平称赞过的县委书记：
焦裕禄、王伯祥、谷文昌

焦裕禄，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习近平不止一次提倡和要求党员干部向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学习，他指出，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时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于1990年7月15日作了一首词，题为《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上阕“追思”，以记叙为主，写焦裕禄的功绩，百姓对他的爱戴、缅怀，诗人对他的评价。下阕明志，以抒情为主，写焦裕禄精神对诗人的影响，表达执政为民、造福百姓、恩泽万众的理想和宏愿。2014年3月，习近平重访兰考，有感于焦裕禄为人民服务之精神，重诵此词，深情地谈到：“虽然焦裕禄离开我们50年了，但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

王伯祥，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2010年12月31日，王伯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王伯祥同志和报告团时指出，王伯祥同志是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并要求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着力造就高素质县委书记队伍。习近平说：“像他那样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忠实实践者；像他那样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心一意地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像他那样树立正确的工作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真抓实干，争创一流业绩；像他那样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严于律己，秉公办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谷文昌，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丰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与焦裕禄一样是习近平大力提倡的干部楷模。习近平在《之江新语》(连载)中说:“福建东山县的县委书记谷文昌之所以一直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仰，是因为他在任时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带领当地干部群众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沿海建成了一道惠及子孙后代的防护林，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习近平手把手“授课”：
县委书记如何当好官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的200余名学员畅谈交流

“县委书记经”。在这场200名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参加的座谈会上，习近平的“授课焦点”只有一个：如何做合格的县委书记。总书记不仅提出了问题，也给出了明确答案，合格的县委书记就是要做到“四有”——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习近平告诫县委书记，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2008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县委书记培训班学员代表座谈会上强调，县委书记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一定要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励精图治，奋发进取，增长才干、建功立业。

习近平对县委书记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使读书学习成为充实知识、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成为加强修养、培养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第二，要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树立县委书记尽职尽责、忠诚于党的形象，开拓进取、克难攻坚的形象，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形象，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的形象，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第三，要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引导群众不断前进，切实提高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第四，要善于当好班长、带好队伍，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在各方面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团结县委领导班子成员齐心协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习近平撰文谈县委书记：
官不大而责任不小

习近平《摆脱贫困》(连载)一书收录一篇题为《从政杂谈》的文章，文章谈及县委书记的责任。文中谈到，古时候，人们以“七品芝麻官”来喻指县令的官微权轻，有贬损之意。其实，当好一县之长何尝容易。我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每与同行谈起，大家总有一致的感慨：官不大而责任不小。

习近平说，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三千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

一个县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社会。中央有什么机构，县一般也有与其大体相对应的部门。县一级工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所不及。有人说，县级工作，除了外交活动外，国家各项事务无所不有。其实，有时候县里也会遇到接待外宾的事情，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外宾比肩接踵而来也是可期待的。县级领导还得懂懂一点外交。一个县小则十几万人，大则百把万人，一个决策下去，其影响非同小可，来不得半点含糊。海瑞在他的《令箴》中说：“官之至难者，令也。”此意即最难做的官是县官。因此，县级领导必须有各方面的知识和很强的能力，否则难以胜任。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红旗渠近亿投资却零贪污的真相

红旗渠总干渠通水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赴河南林州调研，再谈党风廉政建设。

鲜为人知的是，历时十年、投资近亿元的红旗渠工程，未发生一起贪污或挪用修渠物资事件，没有一个干部失职渎职，连账单都有整有零、清晰可查。

账单有整有零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去过红旗渠纪念馆的，很难不对一口黑色木箱子印象深刻。那是上世纪60年代修渠时的炸药箱，外观平淡无奇，盖子内壁却贴着一张字条，泛黄斑驳的纸页上，“收据”两个字隐约可辨。“我怕以后说不清楚。”时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组织股股长彭士俊回忆，民工可以数月轮换，指挥部的干部常年驻守工地，衣物无处存放。后来由财务部门作价，买了个废弃的炸药箱。彭士俊怕影响不好，干脆把收据贴在盖子上。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种束缚，更是保护。”红旗渠精神研究者申伏生认为，半个世纪前的小小收据，透露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机制的信号，“干部对制度心存敬畏，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这张收据条，只是红旗渠账目明晰、制度严密的一个缩影。自1960年2月至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6865.64万元，累计消耗钢材123.5吨、水泥6705吨、炸药2740吨，单从这组有整有零的数字，足以想象背后是多么缜密的管理系统。

“爆破石头的炸药量都是有数的，工具无故超损要赔偿。”67岁的红旗渠特等劳模张买江在修渠中负责爆破，他记得很清楚，根据石头密度不同，规定的炸药使用量从2两到6两不等，鼓励节约、超用不补。

红旗渠纪念馆的展柜里，至今保留着几张票据，可以一窥当年的工程面貌。一张开具于1963年4月29日的发货票证显示，当时购买了总价375元的125根钢钎；某集体伙房账目记载，“天1561.5，粮2342.25，款624.50元”，今天若有心查询对照，可轻易算出人均消耗多少。“修渠物资分类管理，出入有手续，调拨有凭据，月月清点。”曾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的王文全介绍，粮食、资金补助的发放程序也很严格，根据记工表、伙食表、工伤条等单据对照执行，几乎不可能虚报冒领。

靠制度管理权、钱、权的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腐败。研究者指出，把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早在半个世纪前的红旗渠建设中就得到了生动贯彻。

干部弊绝风清
“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利益为重”

当人们为悬挂在太行绝壁的红旗渠心折称叹时，很少会想到，在经济困难的上世纪60年代，投入30万人力修建这样艰巨的工程，当地干部群体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林县再缺水能渴到县委书记吗？”电影纪录片《红旗渠》摄影师赵化言词直白，他认为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敢不敢为人民负责，“杨贵完全可以当几年太平官，他冒险修渠是出于共产党员的责任心，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老百姓反对怎么办？上级给处分怎么办？工程失败怎么交代？这些尖锐的问题摆在林县县委面前。红旗渠总设计师、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回忆录中谈到，修渠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面对争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

长期缺水是林县最深、最痛的记忆，从清朝后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志上频频“大旱、连旱、凶旱、亢旱”等字眼，甚至有人因打翻水桶自责上吊。林县县委成员多番走访，确定修渠引水是老百姓的衷心期盼。

此后，红旗渠工程遭受数次考验。修建初期，有人举报“林县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工程建设”；总干渠修至一半，有关方面下达百日休整文件，要求建设中的大型工程停工；因为动用县里退赔款修建红旗渠，上级派来了调查组。

“要干好一件事，应该无私无畏、忍辱负重，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红旗渠通水后彻底改写了林县缺水的历史，成为造福一方的“幸福渠”。时隔多年回顾，杨贵总结，“如果碰到风险就退缩，再好的事情也办不成。”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太森认为，红旗渠蕴含着对党的优良传统、共产党人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正确的群众观、利益观、政绩观和荣誉观的体现。

88岁的红旗渠建设劳模李天德回忆，在红旗渠工地上，看不出谁是干部谁是民工。总指挥长、副县长马有金是抡大锤的好手，抡开12磅大锤，一口气能打一百多下。由于长期风吹日晒，他脸膛黝黑，人称“黑老马”，“县长”倒很少被提起。

干部和民工的区别，在领给养补助时最明显。当时除自带口粮外，工地上根据物资供应情况，给予一定补助。1960年2月至8月，民工补2市斤，干部补1.5市斤；1961年至1966年，民工补1.8市斤，干部补1.2市斤……干部的标准始终低于群众。

一碗小米干饭的故事至今仍为健在的修渠者津津乐道。有一天，炊事员看杨贵干活太累，偷偷给他蒸了一碗小米干饭。杨贵很生气：“群众吃啥我吃啥，这米饭谁蒸的谁吃！”最后，这碗干饭倒进大锅里煮成粥，30个人分着喝了。

“我最佩服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那时干部跟我们一起吃糠咽野菜。”在张买江的讲述中，干部和民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级指挥部都是住山洞或搭席棚，没用修渠的钱盖过一间房。最困难的时候，总指挥部的办公经费连点煤油灯的开支都不够。

“党员干部能够领导人民办大事，前提是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否则将举步维艰。”申伏生指出，参与修渠的大小干部上千名，他们用行动彰显了党的纯洁信念和优良作风。

干群齐心协力筑梦
“干部能流一滴汗，群众汗水流成河”

林县流传一句话，“干部能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干部能流一滴汗，群众的汗水流成河”。这是红旗渠建设时代留下的，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领会其中的深情厚谊。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时刻豁得出来，党员干部凭借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成为修渠群众的贴心人、主心骨。”申伏生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在密切干群关系、调动群众参与意识方面作用显著。红旗渠景区资深讲解员李蕾的曾祖母在105岁高龄去世，她曾说，红旗渠工程在别的时代是不敢想象的。修渠前，公社和村民小组的干部做思想动员，让老百姓明白是为谁修。

“修这条渠等于在自家院里打井呢，你不出力谁出力？现在不出力将来根本没脸吃渠里的



水。”李蕾转述曾祖母的话。据统计，开工第一天，就有三万七千人报名。6000多万元的红旗渠建设总投资，国家拨款仅占15%，85%都是群众自筹。

“干部冲锋在前、与群众同甘共苦，形成了一种无声无形却强大有效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群众的修渠热情空前高涨。”林州市纪委撰文称，干部作风关乎民心向背，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红旗渠开挖没多久，张买江的父亲就牺牲在了渠上。母亲把13岁的他往外推，“你上渠，渠里不来水，你别回家！”按照规定，18岁至60岁之间的青壮年负责修渠，不到或超出的往往瞒报年龄。当时林县有50万人口，其中30万人参与了红旗渠建设。

“修建红旗渠是我们党抓住了群众的根本需求，从群众身上汲取不可思议能量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党领导人民筑梦圆梦的伟大创造。”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认为，红旗渠是践行群众路线、汇聚群众力量的典型范例，党员干部以此为镜，可以直观对照出自身的不足。

来源:《北京日报》 摘自人民网

责任编辑 郭兴荣